

硝烟中诞生的上党银号

屈欣

史事经纬

1938年8月，为了发展根据地经济，中国共产党在山西省沁县创办了上党银号。上党银号以及其所发行的上党票，在打击伪钞、刺激生产、调剂金融等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极大地促进了晋东南根据地的战时经济稳定和发展，且积累了一定的货币斗争经验，为后来冀南银行的成立和发展积累了经验。

创立于危难之际

1938年4月，八路军一二九师带领晋东南军民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恢复并发展了以沁县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随后中共冀豫晋省委随同总部也返回山西省第三专区所在地沁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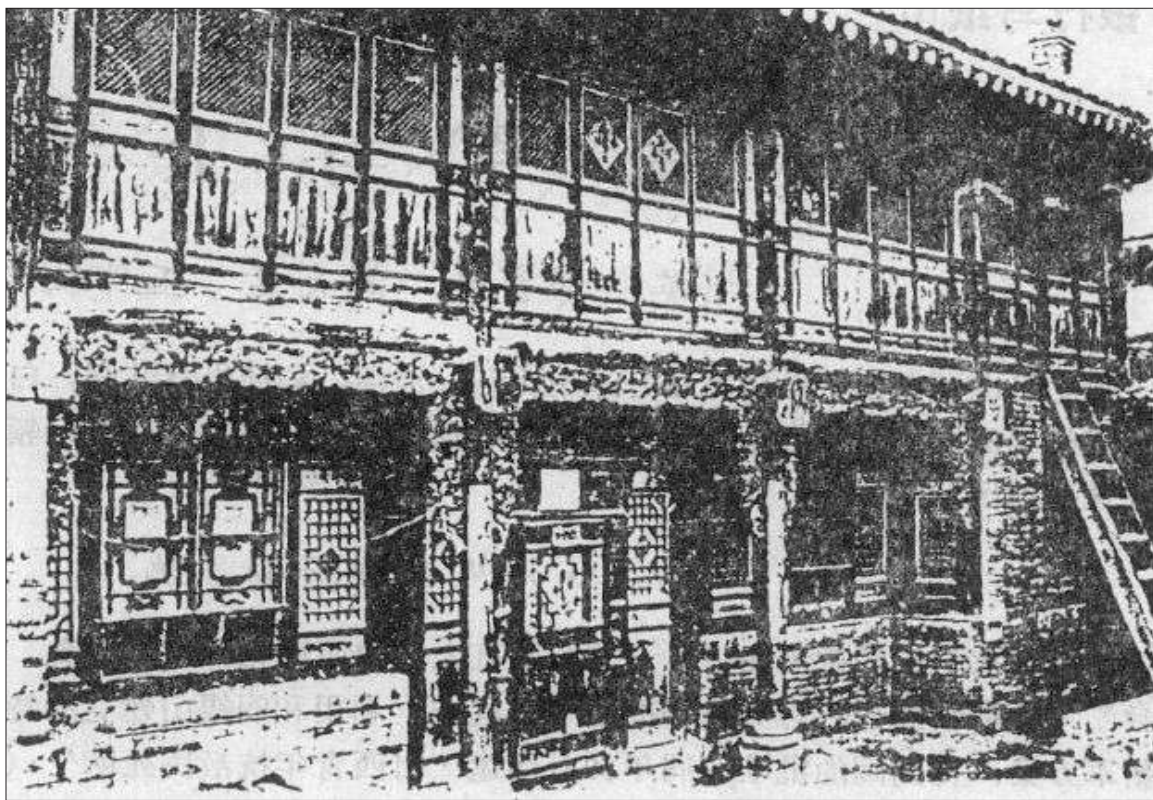
1938年8月，出于贯彻抗日根据地“独立自主”的建设原则以及发展根据地内部经济、稳定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实际考虑，中共冀豫晋省委决定成立自己的银行，掌握、发展根据地的财政。8月末，在根据地八路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以及山西省第三行政专署和第五行政专署的组织筹备下，上党银号在山西沁县正式创立。银号内部设有会计股、发行股、总务股和营业股等科室，归第三专署秘书处、财粮科统筹管理。外部设有印刷厂一处，负责办理纸钞、宣传小报、公文表格等的印刷业务。

经过短时间的发张扩充，银号人员陆续配齐，有出纳员、兑换员、各股的干事、勤杂以及印刷、装订人员等，共计80余人。所有工作人员享受部队供给制待遇，穿军装。除了给印、副管理各配备一匹马之外，行政专署还给银号拨配冲锋枪4支、手枪2支、步枪8支、骡马6匹及铁皮保险柜1个，用于保障日常业务的正常开展。银号实际负责人为主管王贺五、副主管王干卿、会计股长刘大枪、出纳股长焦俊熙、总务股长范烈侯、营业股长李培云等人。

1939年初，随着辐射范围的不断扩大，上党银号又相继在长治、辽县、沁源等地设立分号。银号除发行纸币外，还开展了兑换、低利借贷、救济失业工人等金融业务，并与伪币进行了复杂的货币斗争。

多面额纸币的发行与流通

上党银号的基本任务是发行货币，活跃经济，筹划财务，扶持生产。上党银号发行的货币，称为上党票，这是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行最早的



► 开业时的上党银号

一种货币。

上党银号创办时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四个部分：其一是第三行政专署划拨的20万元财政经费，以法币和省钞作混合支付；其二是第三专署下辖各县集资上缴以及士绅富商的捐助，约30万元；其三是社会各界捐赠10万余元；其四是阎锡山给晋东南抗日军民部队的供给经费。通过经费划拨与军民自筹，上党银号总计筹资近百万元，为纸币的发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8年秋，上党票正式印制，由银号副管理王干卿全权负责。建设之初，计划按照三专区总人口平均每人3元的数额发行上党票，总发行金额共300余万元。印制的面额分别为伍元（红版）、壹元（蓝版）、伍角、贰角、壹角5种。其中，伍元、壹元为本币，伍角、贰角、壹角等小额钞票为辅币。

1939年3月，为适应流通和使用的需要，上党银号决定在本币和辅币的基础上，发行分单位辅币。随即在沁县桃卜沟增印壹分、贰分、伍分三种辅币。不过，由于当时局势紧张，这些以分为单位的辅币夭折于萌芽之初，未能上市流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上党票的布局规模与流通范围。

从钱币式样和印制过程来看，上党票已经初步具备了近代纸钞的特点和要素。所有票面上印有“上党银号”4个篆字，防伪暗记以及经理、副经理的章印。印刷流程也非常严格。设计人员要先把设计好的钞票图稿精细地画在药板上，再反印在石料上，然后由专门刻版人员精心雕刻。工艺要求极其严格，没有任何的辅助设备，一刀刻错，整版报废。钞票完成后，装机印刷，上一遍油墨印刷一张，印刷工人再用水布抹一次版面。印成之后，经过清点验

收，打上编号，盖上骑缝章，经发行股备案后方可发行。准予发行的上党票由上党银号发行股派专人押送，用驮骡走太行山路秘密送往沁县、屯留等地，然后再转往其他分号。

上党票发行之初，因为信誉较高，又因有多种面额便于交易，得到了民众的普遍欢迎和广泛使用。上党票与法币、晋钞、银圆相比价流通于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第三、第五两个专署所辖的28个县，流通区域覆盖晋东南地区两万多平方公里，300多万人口。后期，在晋南、晋中、冀南和太行山东麓的部分区县也曾流通使用，影响甚广。

光荣完成历史使命

上党银号成立后，曾在沁县郭村等地驻扎，之后由于形势紧张，为了防备日军进攻，银号又先后从沁县的北神山、龙泉寺搬迁到沁源县的陈家岭、崔家沟一带活动。1938年秋，由于对敌斗争的需要，上党银号及所属的印刷厂才从沁县的桃拔沟搬迁到沁源县的塔则沟，重新开展了各项业务，恢复了印刷厂的生产。银号从沁源桃拔沟搬迁前，先派了几名同志到塔则沟一带察看地形，并向当地老百姓了解了附近的情况，而后才派后勤人员到塔则沟选房。他们选了20多间住房，选择了印刷厂的机房，还选了马棚、草房。一切准备就绪后，银号及印刷厂才于当年深秋全部搬到塔则沟。

上党银号及其印刷厂在塔则沟期间，得到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都主动为银号办事。他们常常去沁县、屯留、安泽等地，为银号采购、驮运粮食及其他物资，居住在塔则沟附近村树背的史来管则主动为银号做豆腐，并亲自送到伙房。妇女们则利用空闲为银号的同志们缝补、洗涤衣物。银号的同志

也经常和老百姓拉家常，帮群众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在春种、夏锄、秋收农忙季节里，银号的同志们利用休息时间帮老百姓送粪、下种、锄苗、收割打场，赢得了群众的赞誉。

1939年7月，日军6个师团5万余人，分六路向晋东南发动第二次“九路围攻”。下属的第一〇九师团南犯交口，侵占了沁县县城，上党银号的生存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挑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根据上级指示，上党银号与第三行政专署党、政、军机关部队共同进行战略转移，到外线打击日军。部队在转移途中与日军遭遇。八路军利用山林有利地形与日军浴血奋战，予敌重创，成功突出了日军的重围。

上党银号总号再次跟随专署机关向沁源西部大林区转移。行至牛窑坪、韩家沟、姚家庄一带时，和日军发生激烈战斗。日军大“扫荡”结束后，上党银号随同决死一纵队继续战斗在沁源城南一带。但在战斗中，上党银号所带的几十驮账簿、钱钞都有散失，部分驮骡落入敌手，大量钞票也在战火中毁于一旦，但是银号的实力尚存，上党票也仍然在继续发行和流通。

不久，根据形势需要，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划分为太行区和太岳区，在太行区党政机关的领导下，1939年10月15日，冀南银行在黎城县小寨村成立，发行冀南本位币。1939年10月，冀南银行在山西黎城正式成立，突破敌人重围的上党银号工作人员及遗留财产相继并入冀南银行。尚在流通的上党票也以田赋、税收和向冀南银行借贷的办法，按七折兑换收回”（据《新华日报》华北版报道，截至1942年1月3日，已收回上党票110万元）。至此，曾对山西抗战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上党银号完成了它的光荣使命。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学院）

红色足迹

八路军重创“摩擦专家”

常红

1939年1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命令各路顽军向太行、冀南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企图“驱除太行山区八路军”，对晋东南八路军“形成包围态势”，伺机“断然围歼之”。驻防冀西地区的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军朱怀冰（外号“摩擦专家”）接到命令后，首先率部袭击一二九师先遣支队、青年纵队，打死打伤八路军150余人，抢走大量军用物资；同时准备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致电国民党当局，呼吁消除摩擦、团结对敌，朱怀冰竟置之不理。为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巩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和整个晋冀豫边区，八路军一二九师遵照总部命令，奋起展开反顽作战。1940年3月5日开始，八路军一二九师青年纵队、独立支队、先遣支队、独立游击支队、三八六旅新一团、师部特务团及晋察冀挺进支队、冀中警备旅共13个团，在八路军总部指挥下，向分布在武涉公路以南，漳河以北地区的国民党九十七军朱怀冰部发起攻击，打响了涉及磁县、武安、涉县、林县的磁武涉林战役。

3月5日2时，八路军首先反击进占古台、南王庄、齐家岭等地的顽军，连续攻拔碉

堡50余座。朱怀冰部队遭受打击后，迅速龟缩到南北两岔口、东西花园、南北贾壁一带。朱怀冰认为他的部队阵地前有国民党新编第五军作“屏障”，可以固守待援，不料新编第五军被打入该军的中共地下党员晓以利害后，对八路军持中立态度，允许八路军借道通过该军防区围歼朱怀冰部。6日，八路军先后攻克了南北岔口、东西花园、南北贾壁等地的顽军阵地。顽军丢下后方机关和全部辎重向南逃窜。

八路军参战各部不顾疲劳，进行穷追猛打，8日4时，于姚村以东截住逃窜的顽军主力一部，经7小时激战，歼其3000余人。其残部3000余人溃逃至临淇地区，又遭到八路军的截击。在八路军的反击下，朱怀冰率残部约2000人狼狽退入修武县境内。

此次战役，八路军共歼灭国民党顽军和其他土顽武装万余人，控制了武安公路以南、西平罗和临淇镇以北地区。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及时命令八路军停止追击朱怀冰残部，主动后撤，并提出休战。为了表示不愿扩大武装冲突、团结抗日的诚意，八路军对俘虏进行了教育后，分批交还给了朱怀冰等部。被俘虏的家眷也派人送了回去。3月中旬，国共两党就停战、驻军达成协议，以临屯公路及长乐、高平公路为界，以南、以西为国民党军驻区，以北、以东为八路军驻区，共同抗日。

抗联第三路军夜袭嫩江机场

吴小龙

1939年5月30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成立，全军800余人，李兆麟任总指挥。抗联第三路军发表了成立宣言，热情歌颂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游击运动，号召武装抗日的战友们，东北各族人民、各界同胞“以最大的精诚团结的热诚心、忠勇和毅力，去和寇寇血战，站在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共同胜利的立场……以积极果敢精神，来破坏日寇在东北之一切军政设施，截夺敌寇武装供给，领导民众斗争，争取东北抗日运动的新的开展”。

此后，北满抗联部队在第三路军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下，积极开展游击活动，黑嫩平原的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当时，日军嫩江一号飞机场坐落在嫩江县城东北方向10公里处，机场内设施完备，停放着多架日军先进战机。为了打击日军的气焰，李兆麟决定袭击嫩江一号飞机场，将任务交给了十二团。

十二团接到任务后，利用嫩江一号飞机场扩建的契机，派18岁的侦察班长史化鹏以劳工身份打进机场。史化鹏在嫩江群众支持下，混进劳工队伍。由于他干活“卖力”，很快被机场当局委任为小队队长。利用这个身份，他很快摸清了机场兵力部署、飞机类型和停放数量、配套设施及敌人的活动规律等情报。一号机场扩建主要项目是修跑道和停机坪，需要大量石方。爆破山石危险性大。他就主动“请缨”学爆破，还利用独立作业的机会，把他带领的12名劳工发展为救国协会会员，在日本关东军眼皮底下掌握了一支抗日力量。

日军守卫机场陆勤队有1个守备中队，3个小队。7月份，2个小队押送劳工到嫩江车站卸水泥等建材物资。守卫机场只



行进中的抗联指战员

剩1个小队，力量比较薄弱，是攻打飞机场的绝好时机。十二团得知这个消息，即刻决定采取夜间奇袭行动，当时十二团已经改装为骑兵团，从200多公里外的讷河县五区直扑嫩江一号飞机场。

此次战斗，十二团实际投入兵力只有100人左右，分为4路——三路分别埋伏于道路上，准备阻击前来救援的敌人；十二团政治部主任王钧亲率一队人马，经飞机场东南方无人区潜入机场。

夜里12时，王钧率领的队伍率先行动，他们清除了敌人哨兵，切断了电话线。12时30分战斗打响后，史化鹏率队包围了日军守备中队营房，将集束手榴弹投了进去，并辅以机枪火力，干净利落地歼灭了30多个敌人。接着，战士们向敌人的飞行员营房发起进攻，击毙了几个妄图强行起飞的家伙，停在停机坪上的8架敌机也被战士们引爆炸毁。

随后，十二团一面打扫战场，一面破坏了机场设施，点燃了建设中的油库，烧毁了待运物资。熊熊烈火中，嫩江一号机场被彻底摧毁，全部化为灰烬。战斗结束后，王钧在日军机场墙壁上写下了12个大字：今天折你翅膀，来日平原再战！

史海观澜

新四军救治友军伤员

杲学军

1939年新四军豫鄂挺进游击纵队成立后，栗秀真被组织上任命为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野战医院院长。当时，纵队司令部驻八字门，政治部、随营军校、野战医院等机构均驻八字门附近村湾。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成立后，活跃于鄂豫边地区，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在积极开展对日伪作战的同时，严格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友军开展协作，共同对敌。

当时，为防敌人进攻宜昌，友军一二一师奉命防守襄河一线，豫鄂挺进纵队和他们取得联系，并配合作战，取得了多对敌作战的多次胜利。随着战局的发展，伤员越来越多，各路伤员如潮水般涌入医院，栗秀真决定开放医院大门，收治所有伤员。为了帮助伤员尽快康复，栗秀真率领全体医护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

1940年5月1日，日军发动枣宜会战。为策应主力作战，一二一师奉命挺进敌后。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和一二一师部队密切合作，歼灭日军一个运输大队5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骡马、军需物资。

几天后，日军集中兵力进行“报复”，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和友军一二一师奋力反击，战斗十分激烈。栗秀真率领野战医院医护人员在湖北京山县石板河东北的赵家冲一带为前线伤员治疗。由于敌情紧迫，需要立即转移。在转移途中，

栗秀真遇到了一二一师师长牟廷芳。栗秀真当即提出豫鄂挺进纵队野战医院可派人参加战场救护工作，并可以赠送急需的药品。牟廷芳听后非常感动。随后又委婉提出：希望新四军野战医院能够帮助收治部分伤员。栗秀真听后立即答应，并表示伤员的吃住、治疗均由医院全部负责。

随后，栗秀真立即联系当地干部组织群众担架队，将一二一师的伤员全部抬至野战医院的隐蔽点，并立即组织力量抢救、治疗。当夜，一二一师又派人护送一批伤员来到新四军野战医院。栗秀真于凌晨率护理人员及时进行抢救，并热情接待护送人员。

一二一师伤员住院期间，栗秀真本着“都是抗日健儿”的原则，让他们和新四军伤员享受同等的待遇——医院动物干部群众搞来的牛奶、猪肉、鸡蛋、白糖都平均分配。治疗期间，为了鼓舞士气，医院还组织友军伤员参加医院举办的文艺活动，并向他们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二一师的伤员都深受感动，不少人提出：伤愈后要参加新四军。为了维护团结抗战的大局，栗秀真和医院干部亲自出面，劝说他们“坚守岗位，不能留下”。在新四军医务人员认真照料下，大部分一二一师的伤员恢复很快。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一二一师伤员陆续康复。1940年7月末的一天，最后一批伤员出院，栗秀真特别为伤员们举办了欢送会。一二一师还派人到医院驻地致谢。

永安寺起义前后

贾晓明



陈伯衡

并很快发展到500余人。

陈伯衡、刘启文、曹志尚等认为：要想真正抗日救国，只有听从共产党的领导。经商议，大家公推陈伯衡去寻找共产党人来汶上领导抗日。

1937年11月初，陈伯衡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先”的关系，找到了中共鲁西南地下工委成

员江明。江明热情称赞了汶上义士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当即决定派遣共产党员刘星，以中华民族抗日解放先锋队的名义，协助陈伯衡等组织骨干，发动起义。

刘星与陈伯衡一同回到汶上，住在陈伯衡家中，详细听取了陈伯衡等人的汇报，首先向领导骨干们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有钱出钱”，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中共山东省委制订的抗日游击队十条纲领等，继之部署他们分赴各区进一步扩大动员，筹备枪支弹药，并决定将民族解放社、农民福利会合并入中华民族抗日解放先锋队。

1938年1月14日，刘星、陈伯衡等在战湾村王相三酒店（此时力生合作社已由县城内迁至此地）召开了部分领导骨干会议，决定了举行武装起义的时间、地点及有关事项。会后，大家分头行动，走村串户，从人员、枪支、钱财等方面，做了大量动员筹备工

作，并先后在张场小学、战湾村召开两次骨干分子会议，商讨武装起义事项。陈伯衡和刘星还去了东平县，与东平地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在人员和枪支弹药方面得到了支持。

1938年1月5日，汶上、东平两县爱国志士放弃春节团聚，化装携带各自动员或买来的武器，从四面八方奔向原汶上县老七区中核村的永安寺，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参加起义的有教师、学生、青年农民、商人、手工业者，也有不愿南逃的国民党士兵。陈伯衡携其侄陈允桐、陈允梅、陈允枫同时参加起义，自带长枪2支、短枪1支。

起义队伍正式命名为汶上县人民抗日自卫队。刘星分工政治工作，陈伯衡、曹志尚负责军事行政，刘启文负责后勤。2月12日，起义部队在永安寺进行了十余天的军事训练后，进驻群众基础较好的杨集村。

同年3月底，抗日自卫队东渡汶河，攻克了张楼维持会长杨承德的伪据点，缴获步枪七八支。这次战斗，锋芒初试，部队增强了斗志，提高了威信，人员、枪支大大增加。以后，抗日自卫队编为两个中队，一个宣传队。1939年初，陈伯衡、曹志尚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随着队伍不断壮大和斗争需要，汶上抗日自卫队被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六支队一团。

编后拾遗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立即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者。山东省汶上县的爱国知识分子曹志尚、刘启文等人受其影响，利用在教育界的工作之便，以汶上县县城内的力生文化合作社为联络点，联络各方志士，秘密酝酿抗日救亡活动。

当时，在济南齐鲁中学任教的陈伯衡也随南流亡师生南撤，经汶上时，他听说旧友刘启文、曹志尚等准备组织抗日队伍，遂产生了强烈共鸣，便毅然决定留在汶上进行抗日活动。

为便于接纳、组织同志，陈伯衡等秘密成立了“民族解放社”（主要吸收爱国知识分子）和“农民福利会”（主要吸收进步农民），